

魂系华夏



传记文学选

江苏文艺出版社



魂系华夏

■ 传记文学选

江苏文艺出版社

魂系华夏

——传记文学选（一）

朱明雄 编

*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 插页 264,000 字

1987 年 6 月第 2 版 198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册

ISBN 7-5399-0011-3/I·9

统一书号：10141·1155 定价：2.35 元

责任编辑 苏文

目 录

我的学生时代·····	茅 盾(1)
记人口学家马寅初·····	邓加荣(37)
魂系华夏·····	洪永宏(59)
钱学森在美国·····	文 洋(79)
胡絮青谈老舍·····	王行之(99)
半生自述·····	王映霞(117)
雕塑家的塑像·····	纪 宇(163)
我的舞台生涯·····	赵燕侠(202)
越剧艺坛五十年·····	袁斯洪(229)
宋氏三姐妹·····	〔美国〕罗比·尤恩森(251)
重印后记·····	朱明雄(331)

我的学生时代

茅 盾

小学时代

我们大家庭里有个家塾，已经办了好多年了。我的三个小叔子和二叔祖家的几个孩子都在家塾里念书。老师就是祖父。但是我没有进家塾，父亲不让我去。父亲不赞成祖父教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祖父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这类老书，而且教学不认真，经常丢下学生不管，自顾出门听说书或打小麻将去了。因此，父亲就自选了一些新教材如《字课图识》、《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让母亲来教我。所以，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但是，祖父仍嫌教家塾是个负担，我七岁那年，他就把这教家塾的担子推给了我父亲。父亲那时虽然有低烧，但尚未病倒，他就一边行医，一边教这家塾。我也就因此进了家塾，由父亲亲自教我。我的几个小叔子仍旧学老课本，而我则继续学我的新学。父亲对我十分严格，每天亲自节录课本中四句要我读熟。他说：慢慢地加上去，到一天十句为止。

可是不到一年，父亲病倒了。家塾仍由祖父来教。父亲就把我送到一个亲戚办的私塾中去继续念书。这亲戚就是我曾祖母的侄儿王彦臣。王彦臣教书的特点是坐得住，能一天到晚盯住学生，不象其他私塾先生那样上午应个景儿，下午自去访友、饮茶、打牌去了，所以他的“名声”不错，学生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个。王彦

臣教的当然是老一套，虽然我父亲叮嘱他教我新学，但他不会教。我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大，有大六七岁的，只有王彦臣的一个女儿（即我的表姑母）和我年龄差不多。这个表姑母叫王会悟，后来就是李达（号鹤鸣）的夫人。

又过了半年多，乌镇办起了第一所初级小学——立志小学，我就成为这个小学的第一班学生。立志小学校址在镇中心原立志书院旧址，大门两旁刻着一副大字对联：“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嵌着立志二字。这立志书院是表叔卢鉴泉的祖父卢小菊创办的。卢小菊是个举人，而且高中在前五名内，所以在镇上绅缙中名望很高。他办了立志书院，任山长（院长）。现在在原校址办起立志小学，又由卢鉴泉担任校长。卢表叔那年和我父亲结伴去杭州参加乡试，中了举人，第二年到北京会试落第，就回乡当绅缙。因为他在绅缙中年纪最小，又好动，喜欢管事，办小学的事就推到了他身上。

在卢鉴泉的积极筹划下，开学那天居然到了五六十个学生。学生按年龄分为甲乙二班，大的进甲班，小的进乙班，我被分到了乙班。但上课不到十天，两班学生根据实际水平又互有调换，我调到了甲班。其实两班的课程是差不多的，只是甲班进度快些，而且一开课就学《论语》。同班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小，最大的一个有二十岁，已经结婚了。甲班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我父亲的好朋友沈听蕉，他教国文，兼教修身和历史；另一个姓翁的教学算学，他不是乌镇人。国文课本用的是《速通虚字法》和《论说入门》（这是短则五六百字，长则一千字的言富国强兵之道的论文或史论），修身课本就是《论语》，历史教材是沈听蕉自己编的。至于按规定新式小学应该有的音乐、图画、体操等课程，都没有开。

那时候，父亲已卧床不起，房内总要有侍候，所以我虽说上了学，却时时要照顾家里。好在学校就在我家隔壁，上下课的铃声听得很清楚，我听到铃声再跑去上课也来得及，有时我就干脆请

假不去了。母亲怕我拉下的功课太多，就自己教我，很快我就把《论语》读完了，比学校里的进度快。

《速通虚字法》帮助我造句，《论说入门》则引导我写文章。那时，学校月月有考试，单考国文一课，写一篇文章（常常是史论），还郑重其事地发榜，成绩优秀的奖赏。所以会写史论就很重要。沈听薰先生每周要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经常是史论，如《秦始皇、汉武帝合论》^定之类。他出了题目后，照例要讲解几句，暗示学生怎样立论，怎样从古事论到时事。我们虽然似懂非懂，却都要争分数，自然跟着先生的指引在文章中“论古评今”。

然而我这十岁才出头的儿童实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见解，结果，“硬地上掘曲蟮”，发明了一套三段论的公式：第一，将题目中的人或事叙述几句；第二，论断带感慨；第三，用一句套话来收梢，这句套话是“后之为××者可不×乎？”这是一道万应灵符，因为只要在“为”字下边填上相应的名词，如“人主”“人父”“人友”“将帅”等等，又在“不”字之下填上“慎”“戒”“欢”“勉”一类动词就行了。每星期写一篇史论，把我练得有点“老气横秋”了，可是也使我的作文在学校中出了名，月考和期末考试，我都能带点奖品回家。

在进立志小学的第二年夏天，父亲去世了。母亲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我和弟弟身上。尤其对我，因为我是长子，管教极严，听得下课铃声而我还没回家，一定要查问我为什么迟到，是不是到别处去玩了。有一天，教算学的先生病了，我急要回家，可是一个年纪比我大五、六岁的同学拉着我跟他玩，我不肯，他在后面追，自己不小心在学校大院子一棵桂树旁边跌了一跤，膝头和手腕的皮肤的表层擦破了，手腕上还出了点血。这个同学拉着我到家中向母亲告状。母亲安慰那个同学，又给他几十个制钱，说是医治他那个早已血止的手腕。这时，我的祖母和最会挑剔的二姑母（因她排行是第二）都在场，二姑母还说了几句

讥讽母亲的话，于是母亲突然大怒，拉我上楼，关了房门，拿起从前家塾中的硬木大戒尺，便要打我。过去，母亲也打我，不过用裁衣的竹尺打手心，轻轻几下而已。如今举起这硬木的大戒尺，我怕极了，快步开了房门，直往楼下跑，还听得母亲在房门边恨声说：“你不听管教，我不要你这儿子了。”我一直跑出大门到街上去了。这时惊动了全家。祖母命三叔找我。三叔找不到，回家复命。祖母更着急了，却又不便埋怨我母亲。我在街上走了一会儿，觉得还是应当回学校请沈听蕉先生替我说情。沈先生是看见那个同学自己绊了一跤的。沈先生带我到家中大门内那个小院子里，请母亲出来说话。母亲却不下楼，就在楼上面临院子的窗口听沈先生说明。沈先生说：“这事我当场看见。是那孩子不好，他要追德鸿，自己绊了跤，反诬告德鸿。怕你不信，我来作证。”又说：“大嫂读书知礼，岂不闻孝子事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乎？德鸿做得对。”母亲听了，默然片刻，只说了“谢谢沈先生”就回房去了。祖母不懂沈先生那两句文言，看见母亲只说“谢谢”就回房，以为母亲仍要打我，带我到房中。这时母亲背窗而坐，祖母叫我跪在母亲膝前，我也哭着说：“妈妈，打吧。”母亲泪如雨下，只说了“你的父亲若在，不用我……”就说不下去，拉我起来。

事后，我问母亲，沈先生那几句话是什么意思，母亲说：“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管教他们是要他们学好，父母盛怒之时，用大杖打子女，如果子女不走，打伤了，岂不反而使父母痛心么？所以说大杖则走。”

从此以后，母亲不再打我了。

这年冬季，我毕业了。转入新办的植材高等小学。植材的前身是中西学堂，校址原来在乌镇郊外一二里的孔家花园里。这所谓孔家花园是个无主荒园，略加修葺，算是校舍。这中西学堂，半天学英文，半天读古文，学生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学校住宿，平时出来，排成两列纵队，一律穿白夏布长衫、白帆布鞋，走

路脚弯笔直，目不斜视，十分引人注目，尤其我们这些小生更是羡慕得不得了。现在中西学堂改名为植材高等小学迁移到镇内，并且新建了三排洋房，地址在道教供奉太上老君的所谓“北宫”。太平军与清军在乌镇作战时，这北宫毁了大半，新建的三排洋式房子就在焚毁的空地上，包括六间教室和一间储存物理、化学教学用的药品和器具的小房。教员和学生的宿舍却在剩下的原北宫。

我进植材后，才知道教的课程已经不是原来中西学堂的英文、国文两门，而是增加了算学（代数、几何）、物理、化学、音乐、图画、体操等六七门课，又知道教英文和教新增加的课程的，都是中西学堂的高材生，毕业后由学校保送到上海进了什么速成班，一年后回来做我们的老师的。教我们英文的叫徐承煥，用的课本是内容相当深的纳氏文法第一册（按：英人纳司非尔特编的文法书共四册，最后一册讲到英文修辞学），他还兼教音乐和体操。教代数、几何的是徐的兄弟徐承奎，用的几何课本是《形学备旨》，代数课本是什么记不得了，但进度很快。

教国文的有四个老师，一个就是王彦臣，他现在不办私塾，到新学堂里来教书了，不过教的还是老一套，他教的好象是《礼记》。一个叫张济川，外镇人，他是中西学堂的高材生，由校方保送到日本留学两年回来的，他教《易经》，又兼教物理和化学。上化学课时，他在教室里作实验，使我们大开眼界。另外两个国文教师都是镇上的老秀才，一个教《左传》，一个教《孟子》。教《孟子》的姓周，虽是个秀才，却并不通，他解释《孟子》中“弃甲曳兵而走”一句，把“兵”解释为兵丁，说战败的兵，急于逃命，扔掉盔甲，肩背相磨，仓皇急走，就好象一条人流的绳，被拖着走。但《孟子》的朱注明明说“兵”是武器，我们觉得他讲错了，就向他提出疑问，他硬不认错，直闹到校长那里。校长叫徐晴梅，是个廪生（秀才考得好的可以领一笔奖学金，称廪生），也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大概觉得不能让老秀才在学生面前丢脸，就说：“可能周先生说的是

一种古本的解释吧？”

图画课在当时一般的小学校里是不容易开的，因为教师实在难找。植材小学总算找到了一个，是镇上一位专门替人画尊容的画师。那时，乌镇还见不到照像，人死后，就请画尊容的画师来画一张尊容像，留作纪念。这位画师有六十多岁了，他教我们临摹芥子园画谱，说：“临完了一部芥子园画谱，不论是梅兰竹菊，山水翎毛，就都有了门径。”但是他从不自己动手，只批改我们的画稿，他认为不对的地方，就赏一红杠，大书“再临一次”。

对于音乐，我是喜欢的。音乐用的是沈心工编的课本，其中有一首《黄河》，共四节，现在还记得第一节是“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多少圣贤，生此河干。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安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马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这首歌曲调悲壮，我很喜欢，但不懂歌词的意义，教音乐的徐先生，只教唱，不解释歌词。我问母亲。母亲为我详细解释，并及白草的典故，但乌梁海、乌拉山，母亲也不懂，只说这大概是外国的地名。

进植材的第二年上半年有所谓童生会考。前清末年废科举办学校时，普遍流传，中学毕业算是秀才，高等学校毕业算是举人，京师大学堂毕业算是进士，还钦赐翰林。所以高等小学学生自然是童生了。我记不起植材同什么高等小学会考。只记得植材这次会考是由卢鉴泉表叔主持，出的题目是《试论富国强兵之道》。我把父亲与母亲议论国家大事那些话凑成四百多字，而终之以父亲生前曾反复解释的“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卢表叔对这句加了密圈，并作批语：“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卢表叔特地把这卷子给我的祖父看，又对祖母赞扬我。祖母把卷子给我母亲看后，仍把卷子还给卢表叔。

母亲笑着对我说：“你这篇论文是抬人牙慧的。卢表叔自然不知道，给你个好批语，还特地给祖父看。祖母和二姑妈常常说你

该到我家的纸店做学徒了，我料想卢表叔也知道。他不便反对，所以用这方法。”又说：“去年祖母不许你四叔再去县立小学，卢表叔特地来对祖父说：‘这是袍料改成马褂了！’”原来我母亲为了让我继续念书受到了很大压力。卢表叔把我童生会考的成绩到处宣扬，也是为了帮助我母亲减轻一点压力，使母亲能按照我父亲的遗嘱去做。

我在植材是寄宿的。寄宿生和教师同桌吃饭，肴饌比较好。母亲不惜每月交四元的膳宿费，就是为了使我的营养好一点。因为祖母当家，实际上是二姑妈作主，每月初一、十六、初八、二十三，才吃肉，而且祖母和三个叔父两个姑妈，加上母亲、弟弟和我，即使大碗大块肉，每人所得不多，何况只是小碗，薄薄的几片呢？二姑妈背后说母亲每月花四元是浪费，但钱是母亲的，二姑妈也无可奈何。

这年冬天我患过一次梦游病（家乡土语“活走尸”）。事情经过如下：我的本家叔叔娶亲，我去吃喜酒，随同大家闹新房，直到夜间十二点回家，第二天早上匆匆到植材上课，中饭后我在会计的房内藤椅上躺下，忽又起来低头出校而去，校中以为我有事，因而不问。但我自己，这一切都不知道，只是忽然到了我家门前，这才奇怪为什么又在家门前了。家里人知道是“活走尸”，讲了许多离奇古怪的老古话，例如“活走尸”倘在路上被人一碰，就会倒地不起，就此死去；又如“活走尸”倘遇河道，也不知是河而跳下去，就此淹死等等。母亲却以为梦游是睡眠不足之故，从此不许我熬夜，睡觉时间限在晚上九点。

中 学 时 代

一九〇九年夏季，我从植材学校毕业了，时年十三周岁。母亲准备让我进中学。那时中学只有府里有，也就是杭州、嘉兴、湖

州、宁波、绍兴等地才有。杭州除了中学还有一所初级师范，有人劝我母亲让我考这个师范。师范学校当时有优越条件：不收食宿学费，一年还发两套制服，但毕业后必得当教员。母亲认为父亲遗嘱是要我和弟弟搞实业，当教员与此不符，因此没有让我去。杭州我母亲还嫌远，嘉兴最近，但最后决定让我去考湖州中学（其实湖州与杭州的远近一样），因为本镇有一个亲戚姓费的已在湖中读书，可以有照顾。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乌镇，又是到百里之远的湖州，所以母亲特别不放心。我和姓费的同乘小火轮，费是我的长辈，该称他表叔。到了湖州中学，原想插三年级，但因算术题目完全答错了，只能插二年级。

湖州中学的校舍是爱山书院的旧址加建洋式教室。校后有高数丈的土阜，上有敞厅三间，名为爱山堂，据说与苏东坡有关。至于宿舍，是老式楼房，每房有铺位十来个。

湖州中学的校长沈潜琴，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大地主，在湖州颇有名望。他家有家庭女教师汤国黎，是个有学问的老处女，是乌镇人，但我从未听人说起她，想来她是从小就在外地的。（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的续弦夫人即是这位汤女士。）沈潜琴从不到校，他聘请的教员大都是有学问的人。我记忆中最难忘的是一个教本国地理的（可惜记不起他的姓名了）和一个教国文的，仿佛还记得他姓杨名笏斋。地理是一门枯燥无味的功课，但这位老师却能形象地讲解重要的山山水水及其古迹——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及古战场等等。同学们对此都很感兴趣。至于杨老师他教我们古诗十九首，《日出东南隅》，左太冲《咏史》和白居易的《慈乌夜啼》、《道州民》、《有木》八章。这比我在植材时所读的《易经》要有味得多，而且也容易懂。杨先生还从《庄子》内选若干篇教我们。他不把庄子作为先秦诸子的思想流派之一来看待。他还没这样的认识。他以《庄子》作为最好的古文来教我们。他说，庄子的文章如龙在云中，有时见首，有时忽现全身，夭矫变化，不可猜度。《墨子》

简直不知所云，大部分看不懂。《荀子》、《韩非子》倒容易懂，但就文而论，都不及《庄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先秦时代有那样多的“子”。在植材时，我只知有《孟子》。

湖州中学的体育有“走天桥”、“翻铁杠”等。我第一次练习“走天桥”时，体育老师告诉我：眼朝前看，不朝下看，就能在天桥上来回走，走天桥是容易的，不比翻铁杠。老同学示范过以后，老师叫我走。我记着眼朝前看，轻易从天桥的此端走到彼端，待要往回走时，走到一半，不知怎的朝下一看，两腿就发软了，不敢再走了，只好骑在天桥上，挪动身子，慢慢地爬到了彼端。其实天桥离地面不过丈把高。

至于翻铁杠，我就无法翻。人家身子一跳，两手就抓住铁杠。我身矮，老师抱我上了杠，老师一松，我又落下来了。如此数次，惹得老同学们大笑，更不用说翻铁杠的能手了。从此，我也不再学翻铁杠了。

至于枪操，都是真枪。老同学告诉我，这枪能装九颗子弹，打完再装也不过半分钟就装好，熟练后只要几秒钟。这是从外国买来的，同学们就称之为“洋九响”。真有子弹，而且很多，放在体操用具的储藏室。

我觉得体操不难，开步走，立正，稍息，枪上肩之类，我在植材时学过，但不是真枪，只是木棍。现在是真枪了，我身高还不及枪，上了刺刀以后，我就更显得矮了。枪不知有几斤重，我提枪上肩，就十分困难。枪上肩后，我就站不稳。教师喊开步走，我才挪动一步，肩上的枪不知怎地就下来了。我只好拖着枪走，真成了“曳兵而走”了。从此以后，体操这门课，我就免了。至于踢足球，我算是用尽力一踢，球只在地上滚了七、八尺。因此，同学们赛球时，我只在旁欣赏。

每学期照例有一次“远足”，我欣然参加了。第一次是到道场山，路不远，顶多三十里。我去时刚走不多路，便觉两腿上象挂

了十多斤的铅条，就要在路旁休息。老同学知道我是第一次“远足”，便扶着我跑，说练练就行了。如此挨到了目的地，也不知怎的，回来时我居然能走，不用人扶，不过总要掉队。

现在想来，湖州中学的体操实在是正式的军事操练，“远足”也是“急行军”的别名罢了。

后来事实证明，沈校长这样布置，是有深意的。

我在湖州中学的意外收获是学会了篆刻，这是我在二年级下学期时四年级一个同学教我的。他的父亲会篆刻。他喜欢在父亲工作时站在旁边看，久而久之，就看会了。据这位同学说，“篆刻也分派，以能创新为贵。也要多看前人和同时人的篆刻，以广见闻。”他还说：“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谈到篆刻。”他还教我如何剖开平常的石章：用两根不太粗也不太细的铜丝相绞，使两股成为一股，同一般的麻绳相似，然后用竹片把这铜丝作为弦，成为弓形就成了。解剖石章时就用这铜丝弦作为锯子，象木匠锯木板一样就能把石章剖开。

暑假到了，我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东西来做一把刻字刀。我家的纸店有刻木头的刀，能在木头上凿刻文字或图画。但样子和那个同学所用的篆刻刀不同，我怕不能用。结果，从破阳伞上折取一小段伞骨，是扁形的，宽不到裁衣尺上的一分，长有三寸。把这钢片托纸店的学徒磨成锋利的刻字刀，果然跟同学的特制篆刻刀相近似了。

母亲把父亲遗留下的石章，任我支配。我不曾学写篆字，只好查《康熙字典》，依样画葫芦，用拓印法居然刻成第一个石章。所谓拓印法，也是那个同学教我的。其法如下：把字用浓墨写在薄的毛边纸或宣纸上，然后覆在石章上，用水使有字的纸润泽，再加覆干纸两三层，用指甲反复磨擦，然后尽去其纸，石章即有清晰的反面字。据那位同学说，老手不用拓印，就在石章上刻出反文，比用拓印法更流利而圆润。

一个暑假就在刻石章中消磨完了。又该上学了。这是我在湖州中学的第二年，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了。刚到校就看见校长的布告：愿去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者即报名，交费十元，五天后出发。我当时高兴极了，马上报了名，同时写信给母亲，信中说：我现在身边有十来元，那是母亲给的半年的零用钱（母亲给我每月三元五角零用），如果母亲不赞成我去参观劝业会，那就用零用钱抵账吧。

真没料到，正在出发的前夕，母亲从民信局寄来了信并大洋十元。信中还说：“你在南京看到喜欢的书，或其他东西，只要你手头的钱够，可以买下，日后我再寄钱。”

现在简略地说一说“南洋劝业会”的宗旨及创办经过。南洋（今称东南亚）各地华侨甚多，其拥有大资产者皆愿意为祖国之发展工业尽其力所能及。办劝业会就是为了招徕他们投资兴办工厂并传授管理工业的经验和技术。而且，劝业会陈列之物品多数为江南各省之特产，为南洋各地华侨所喜用，故亦有向南洋各地推销江南各省特产之作用。两江总督端方（满人）、江苏巡抚陈启泰奏请获准（其实参与其事者也有华侨大资本家），在江宁城内公园附近紫竹林一带购地七百亩，建造会场，经费由官商分担。筹备了两年，劝业会于一九一〇年六月五日（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正式开幕。

校方包租了一艘大型小火轮，船上有官舱、房舱、统舱，又拖带两条大木船，载人也装行李，从湖州到南京，行程二日二夜，我们一行共二百多人，包括教师四人，工友二人。在船上住的很舒服。船到无锡，我们上岸换乘火车。拂晓到达南京下关车站，猛抬头看见斗大的“南洋劝业会”五个闪闪发光的字，走近了看，才知是许多小电灯泡连串做成的。我们由教师引导，先到浙江会馆，但会馆早已人满，临时找到一座大庙，大家打地铺，四位教师也不例外。

杨先生安顿了行李，就去访友，回来对我们说：“我们来迟了，但倒有好处。前几天只开放教育、工艺、器械、武备、卫生、农业八个馆，可现在又加了江南制造局出品馆、安徽、山东、浙江、江西、四川、广东、湖北等馆，这些馆内除陈列各该省的特产外，也展出各地名胜古迹的模型。他们早来的只看到八个馆，以为仅此而已，就回去了，实在也不得不回去，因为人家等着你走，他才有住处。我们也只能在此三天半，所以迟到有迟到的好处，这正是老子说的祸福相依。”

此所谓三天半，三天是参观“劝业会”各馆，半天是自由活动，或访友，或购物。

当我们到浙江馆看见展出的绸缎、绍兴酒、金华火腿等特产，倒也等闲视之，可是听说绍兴酒得银奖牌，却大为惊喜。我们对四川、广东等各省展出的土特产，都很赞叹，这才知道我国地大物博，发展工业前途无限。

地理教员对各省的名胜古迹的模型，最感兴趣，他不顾馆中闹哄哄的人丛，常常旁若无人似的对同学们谈这些名胜古迹的历史。

我们看展览的第二天，英文教员闹了个笑话，他在广东厅看见一老一中年两个华侨用英语在谈那引人注目的玻璃桌，他便挤上去也用英语交谈，不料被中年华侨说他发音不准确。此事，英文教师以为无人知道，但是劝业会招待外宾（驻上海的各国领事馆人员）的英文翻译听到了，就传了开来。

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有半天时间的自由活动。我同一些同学去看雨花台。沿雨花台一带路旁，有数不清的小摊，卖各色各样的雨花石。我想买一枚较好的（其实不过花纹好，有二、三种颜色，质透明而已），孝敬母亲，问价钱，却贵得惊人。我只好花几毛钱买几枚最平凡的（一般放在水仙花盆内用的），奉献母亲作个纪念。

但在书坊里我买了一部《世说新语》倒花了一元几角。

在回湖州的旅途中，我把《世说新语》反复看了两遍。我这才知道历史上曾有这些隽永的小故事。

我们回到校内，方知学校已招了新生，其中有个姓张的，二十来岁了，在新生中年龄最大。插二年级的，有董大酋，不过十二三岁。

我们正准备上课，舍监出了布告：沈校长将于明日到校对全体同学讲话，明日上午七时全体同学应在操场集合。

这个布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大家都在猜，从不到校的沈校长为什么要对全体同学讲话，有什么要事。

次日七时，全校教职员和学生齐集操场。一会儿，沈校长和一位矮胖的老人来了。沈校长说自己做校长多年，对教育实在是外行。旋即郑重介绍那老人，大意如下：“这位钱念劬先生，是湖州的最有名望的人。钱先生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外交官，通晓世界大势，学贯中西。现在钱先生回湖州来暂住，我以晚辈之礼恳请钱先生代理校长一个月，提出应兴应革的方略。”

然后舍监宣布散会，大家各回教室上课。

我们回教室不久，钱老先生来到课堂门外听了一会儿就走了。这一节课是杨先生讲的作文，他出了题目，略加解释，我们就构思，一点钟内得交卷。

这天晚上，全校就纷纷议论，说钱老先生听遍了各教师的讲课，有时还进课堂去指出：何者讲错了，何者讲的不详细。大部分教师都挨了批评，而对英文教师的批评是发音不准确。

也在这天晚上，英文教师鼓动全体教师罢教以示抗议，但是除了他本人外，只有杨先生因和他个人交情不浅，勉强附和，其余教员多半不赞成。

第二天，钱老先生来校后，听说有的教师罢教，就对学监说，